40年前 泊头文学青年的诗和远方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1981年，爱好文学的农民诗人余守春在泊头尹圈村创办了“朝花诗社”，朴实的文字、真挚的情感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时任省委书记曾给诗社写信并接见了他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38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介绍这一民间文学组织。

一时间，文学社在泊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一大批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他们记录生活，抒写青春和理想，质朴的文字里展示着这片土地所孕育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。

岁月流逝，诗社已经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，但那份激情仍令人心潮澎湃。近日，记者采访了当年诗社的代表人物，听他们讲述40多年前文学青年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当年，余守春（左三）带领大家学习

芬芳沃野孕育诗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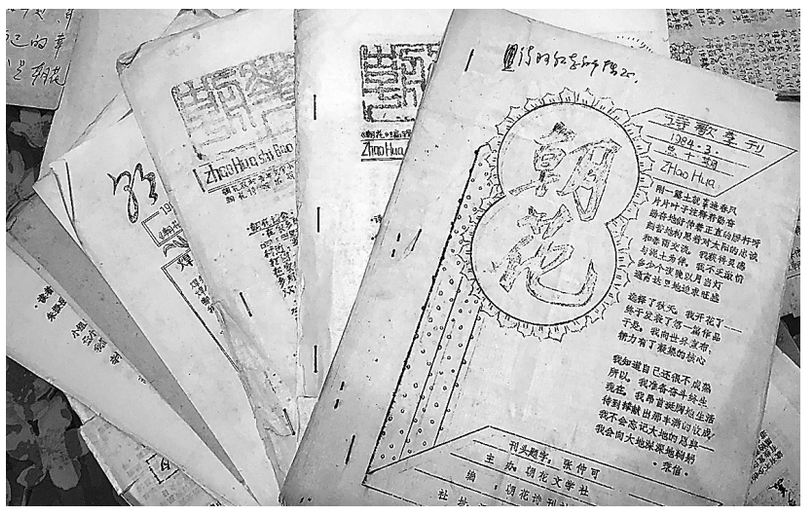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泊头文学社的代表人物，就不得不提余守春。当年，他在自家三间土坯房创办“朝花诗社”，成了无数文学青年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泊头市文庙镇尹圈村——一个三面临水、果林密布的村落，余守春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。1982年4月，刚刚20岁出头、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的他，辞职不干了。他的心里装着一个文学梦，这个梦儿时便已种下。

余守春的父母都会唱民歌，尤其是父亲，有一套现编现唱的功夫。村里有什么喜事，他往那一站，出口成曲。余守春曾整理出一大本父亲的唱词，可父亲一字不识——8岁当长工，12岁扛活、挑水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过农委会主任、大刀队队长……父亲的爱好熏陶了他，父亲的经历启迪了他。

读中学时，余守春在日记上写到：“运河的水，驮着我的欢乐漂着我的愁……”语文老师说：“这是诗！”大概就是那时，诗歌像一粒种子，在余守春的心里生根发芽。1981年1月，他的诗歌入选《河北文学》，8月又敲开了《诗刊》的大门……

余守春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后，慕名来找他的年轻人不少。接触中他发现，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也有了精神生活的需要。1982年7月4日，10多名青年汇聚在余守春家的土屋里，成立了朝花农村青年业余文学小组，余守春任组长。



“我们也许永远做不了诗人、作家，但一定要做一个新型的农民，做一个正直、有责任感、有较高情趣、热爱生活的好青年……”余守春说，大家制定了“组员守则”。从此，他们每个月相聚一次，交流创作、读书的体会。有时，他还为大家讲授文学创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，制定下个月的读书、创作计划。然后，将大家的作品出版在他们自编的《朝花》双月刊上。

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文学的光芒，白天围着庄稼转，晚上沉浸在自己的天地，抒写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时至今日，余守春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黎明——1982年10月24日，他和文友捧着刻了一个星期、印了一个通宵的《朝花》创刊号，一路又蹦又跳，难掩激动之情。

当时，文学社社员的创作热情高涨，几年时间，就写出了500多首诗，40多篇小说、散文、评论，读书笔记、生活札记1万余篇，很多作品被刊发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知名文学刊物上。

余守春更是一头扎进了诗歌的土壤，不管是在地里干活，还是和家人吃饭，只要灵感闪现，他就会立即投入创作。1983年，《无名文学》刊发了他的一组诗，就是在夜里浇地时写的：“如果人生是一棵大树，知识是它的叶子，果实是它的价值，每一个钟头则都像是一朵花。”风云雨雪、四季轮回，大自然的一切，都是他创作的源泉。

从乡间走向全国

随着越来越多社员的文学作品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，《朝花》也在全国引起了反响。1984年9月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来到尹圈村采访，建议小组改名为“朝花文学社”，后来改名“朝花诗社”。不久，电台通过38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介绍了这一民间文学组织。田野中生长的“朝花诗社”，一时间引起了全国关注。

那些或鲜活或深邃的文字流淌出的情感，如此动人且令人难以忘怀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加入。社员从最初的12人扩展到本地27人、外地若干人，“朝花诗社”分社更是多达130多个，遍布全国。而公刘、刘小放、李子等文坛响当当的作家，都曾当过诗社的顾问。

《朝花》有了名气后，全国各地农村青年的来稿、来信雪片般飞来，余守春从一封封来信、来稿中读出了千千万万农村文学青年的激情和对新生活的呼唤，他真切地感到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诗歌时代到来了。

1984年，朝花文学社被沧州地委命名为“建功立业”模范单位；1985年，被团中央命名为“全国新长征突击队”；1988年，被收入《世界著名文学社团名录》……

1984年，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高扬亲自写信：“一小群想做诗人的农村男女青年逐渐赢得了一点声名，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事情——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……”他还接见了余守春，鼓励他创作更多、更好的文学作品。

回望20世纪8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余守春说，那时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：“热血伴真情，纯粹加天真，对社会有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”他们用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，丰富细致地展现了中国乡野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，他们既是时代的书写者，也是被书写者。

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

余守春像一团火焰，既温暖着大家，又点燃了每一位创作者的激情。

在朝花诗社的影响下，泊头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影响较大的也有十几个，如齐桥镇绿韵文学社、富镇富春文学社、四营乡萌芽文学社等。这些文学社拥有社员400多名，分布在各个行业，都是业余文艺创作的爱好者，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作品。

知名作家李子曾撰文回忆当年的文学盛况，他比喻为“一花绽放，百花盛开”。

刚刚退休的王义，曾担任泊头市第二中学校长。当年，他在学校创办了《春华》《秋实》两个文学校刊，刊发学生和老师的作品，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
“阅读开阔人的视野，写作熏陶人的精神。因为有了文学，有了创作，人的内心是丰盈、安静的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”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，他挖掘学生和老师们的文学潜力，培养他们的创作热情，校刊半个月出版一期，深受学生和老师欢迎。

一篇篇朴实动人的文字背后，是一个个鲜活而有趣的灵魂，那些文字从他们的心灵流淌而出，诉说着内心的情感。

“有的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，备受鼓舞，因此爱上了阅读和写作。”王义说，可以说，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文学青年。

57岁的张洪昌至今记得那个火热又激情澎湃的年代。在当年文学热潮的影响下，他喜欢上了文字，进而影响了人生的每一步。不得不说，这影响里有余守春的功劳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书对人们来说是奢侈的，即使不认识几个字，大家也渴望通过读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上学时，同学们知道张洪昌喜欢阅读、爱好写作，就推荐他去尹圈村的“朝花诗社”。后来，他便来到了那里，来到了余守春的家。那时，他还不到18岁。

余守春讲四大名著，讲中国文学史，引经据典、读诗诵词，有时在家里，有时在梨树下、庄稼地，那些动人心弦的文字，一下子为张洪昌打开了一扇窗，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“眼睛”。听着听着，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笑了，他被文学的魅力所折服。从此，他一有空闲就去余守春家里听课，和大家一起交流。有时一待就是一天，中午就在余守春家里吃饭。一个个炽热的目光，透露着他们对知识、对文学的渴望，而他们大多都来自附近的村庄。

对于张洪昌来说，那里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如今回想，历历在目。因为有一定文字功底，他一直从事文字工作，也从乡间走到了城市。

当年，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来到这里，又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。有的从农村走到了城市，命运因读书而改变；有的孜孜求学，出版了多部著作；有的虽没有从事文字工作，但依然坚持写作，写生活、写人生。当年的文学社，带给大家的不仅是书页上的文字，还有那些文字迸发出来持久激荡人心的温暖而又坚定的力量。

革命后代捐款助力海兴红色文化

本报讯（杨静然 金连广）近日，海兴县党史办收到一笔特殊的“捐款”——浙江省杭州市退休干部范洪捐赠万元，用于海兴的红色文化发展。

范洪是抗战时期小山区区长范长寿的长子，他希望通过海兴县党史办转给河北好人典型代表、红色义务宣讲员巴连甲，用于张皮庄村红色爱国教育基地和烈士陵园的充实和修缮。

范洪出生于革命家庭，有着深厚的红色情结。他的父亲范长寿1942年至1948年在小山一带战斗生活，担任区长、区委书记职务，为冀鲁边小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在广大革命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。范洪的母亲姚瑞兰是海兴县刘王前村人，也曾参加革命、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。1949年，范长寿夫妇南下，1984年，范长寿病逝，享年70岁。

范洪说：“海兴是我父母战斗生活的地方，是我最眷念、崇敬的家乡。”近几年，他多次来到海兴，寻访父母亲的战斗往事，看望慰问革命家属和亲人，对海兴的红色革命史有了一定了解，也整理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。国庆节期间，范洪夫妇及家人再次来到海兴县，参观了张皮庄村红色爱国教育基地、文物古迹等。他深感挖掘弘扬红色文化对传承革命精神、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意义，于是决定为张皮庄烈士陵园和红色爱国教育基地捐款。

李玉琪 从肃宁走出的优秀军事指挥员

杨进涛 杨静然

80多年前，肃宁县付家佐镇葛家庄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走出过一位青年，后来成为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、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，他就是李玉琪。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参与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，他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保家卫国的国防事业上。

投笔从戎 抗击日本侵略者

1924年4月，李玉琪出生在葛家庄村，兄弟姊妹3人。当时的李家是附近的大户人家，生活无忧、天资聪颖的李玉琪自小就读书识字，知书达理。1939年，年仅15岁的李玉琪毅然投笔从戎，参加八路军，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。他征战南北，历经多次惨烈的战斗。

战争中，李玉琪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但他从不畏惧。1942年，在冀中反“五一大扫荡”时，因被鬼子包围，他临危不惧，突破了封锁，脱险归队。由于作战英勇，他参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还被冀中军区评为模范党员。

李玉琪所在的三十三团，前身是孟庆山创建的河北游击军之一部。1938年5月改编为第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十支队（即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）第三十大队。他们依靠人民群众，活跃在冀中安新、雄县、任丘、蠡县等地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。

1940年6月，为解救被敌人抓去的抗日地方干部，李玉琪所在的三十三团二营趁夜袭击了肃宁县东青口据点，将人救出，还打死数名敌人，缴获了枪支。在敌援军未到前，迅速撤出战斗。1940年9月的一个黑夜，三十三团二营在梁村敌据点，与敌人激战两个小时，全歼敌人，缴获步枪、手枪数十支，被当时的《晋察冀抗敌报》刊载，十分鼓舞人心。

后来，李玉琪还参加攻打付佐、袭击玉皇庙、解放任丘等多次战斗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5年12月，李玉琪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平绥路战役；1947年12月下旬至1948年4月，他率部参加涞水战役和察南绥东战役。平津战役期间，李玉琪所部会同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……在战火的淬炼下，李玉琪由一名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，也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。

抗美援朝 浴血奋战建奇功

1950年12月，李玉琪所在的63军移驻山东省邹县（今邹城）地区整训，并被任命为188师炮兵主任。随后，他们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63军，作为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。

陌生的环境、恶劣的天气，李玉琪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。

1951年5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势如潮，出其不意地渡过临津江和北汉江，直逼其首都汉城。然而随着战役的深入，我军后勤补给不足的劣势愈发明显。铁原地区铁路纵横，是通往“三八线”最便捷的交通枢纽，也是志愿军的后方补给基地。谁能抢占铁原就掌握了先机。

敌我双方迅速移动，铁原成了必经要道。

1951年5月30日凌晨，地动山摇的炮声，震碎了铁原上空的宁静。美军不断向铁原志愿军的阵地上发射炮弹。此时，我军迅速布阵，一场血肉比拼也就此展开。1951年6月3日拂晓，美军发起多路攻击。枪林弹雨中，已是副师长的李玉琪沉着指挥作战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在铁原阵地上，63军挡住了美军4个主力师、整整14天的猛攻。

李玉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，根本没想着能活着回来。一次，他乘坐吉普车在山间行进，美军的飞机呼啸而来，前面的两辆车都被炸飞，他们在硝烟弥漫中穿过去，后面的车也被炸弹击中.……真是九死一生，战争的惨烈，李玉琪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在入朝作战中，李玉琪所在的部队还创造了步枪机枪打下美军飞机的神奇战绩，被传为佳话。

抗震救灾 演绎军民鱼水情

抗美援朝结束后，李玉琪被选送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，1969年10月，调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，1971年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

1976年7月28日，唐山发生大地震，李玉琪临危受命，担任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，他率领炮兵两个师、19个医疗队紧急开赴震区，开展抢险救灾工作。

当时正值酷暑时节，他们奋不顾身地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白天，战士们挥汗如雨，在废墟里搜寻生命进行抢救，晚上忍着蚊虫叮咬。救援初期，物资匮乏，他们把有限的食物分给伤员吃……在指挥部的帐篷里，李玉琪每天都忙到深夜。

1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李玉琪率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抢救伤员、安置灾民、恢复生产、重建家园的任务。

李玉琪对炮兵建设非常关注，倾注了大量心血。1981年9月，他协助组织人民解放军华北大演习，9月中旬在张家口北部地区举行了一次集我军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等多军兵种组成的部队现代化装备大规模军事演习。

1983年，李玉琪服从组织的安排，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，脱下了穿了一辈子的军装。从军45年，他多次荣立战功，1955年首次授衔为大校军衔，并荣获国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，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。

李玉琪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十分苛刻，却时刻把自己的战友、部下和群众挂在心上，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。

2014年1月3日，李玉琪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、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，他是家乡人民的骄傲。

李玉琪（后排左二）和战友合影